

Financing life

市场经济与财富 (下)

◎张维迎
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
著名经济学教授

政府干预导致市场发育不足

如果我们从市场的几个门类来看,有产品市场、劳动力市场、资本市场、土地市场和技术市场。中国的哪一个市场发展得最好呢?政府干预最少的,发展得最好。

总体而言,产品市场是发展最好的。比如中国的家电产业,政府早就不管了,所以发展得特别好。相比之下,中国的汽车工业,WTO之前管得很紧。吉利的李书福在上世纪90年代就生产了汽车,找政府要批件、要上产业目录,但政府就是不批。你生产汽车,政府不让你上目录,就是不合法的,没法卖。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到处都是外资的品牌,原因就在这里。仔细研究就知道,哪一个产品市场政府限制越多,哪个产品市场问题越多。

劳动力市场也算发展得比较好的市场。中国经济能有这么好的发展,与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和灵活性有很大的关系。但这一块也不是完美的,因为我们有很多户口的限制、移民的限制。很多农民变成工人了,我们不叫作工人,叫农民工,按照身份属于农民,按照工作属于工人——这是制度扭曲产生的怪象。

资本市场、土地市场是问题最多的两个市场。在资本市场上,谁能得到贷款、谁得不到,谁能上市、谁不能上市,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决定的,甚至是由政府规定的。特别是在早期,一个企业要上市融资,需要很多部门的批准,拿到资格的人就获得垄断地位。有关系的人才能拿到这个资格,所以这个市场很不健康。银行贷款也一样,这么多老百姓的钱贷给谁?政府部门说贷给谁就贷给谁,民营企业不容易得到贷款,而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照样可以得到贷款,市场没有效率。



需求就越多,结果就会陷入恶性循环。

所谓竞争,并不是说一个行业有很多企业,而是政府允许自由进入。在中国,石油、电信等行业经常受到批评,真正的问题在哪儿?是政府没有把行业放开,只允许一部分企业做,不允许另一部分企业去做。要使中国的电信企业、石油企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,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除行业进入的管制。这样,即使没有企业马上能够真正进入,仅仅由于潜在的竞争威胁,他们也会努力迎合消费者。

任何限制竞争的做法,只对少数人有利。资源配置要按市场,要按产权。如果不按市场,一定会按特权。任何限制竞争、人为地限定价格的办法,最后只能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得到好处。

相信市场,允许民间扶贫

当然,在任何社会,包括市场经济中,总会有相对贫困的人需要救济,问题是怎么样去救济?

很多人认为,扶贫要靠政府。但在中国,我的研究发现,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,收入差距就越大。好比说,现在政府建设新农村,在农村给一些穷人补贴,这本来是好事,但仔细看一下,钱拨下去之后到谁手里了?大部分没有到最穷的、最需要钱的人手里,而是到了某一个县、某一个部门领导的老家,某个领导的亲戚手里。政府花了很多钱,但没有起到扶贫的作用。

经常有人讲,政府要去做市场上做不了的事——但要打一个注册,很多市场做不了的事,不是它真做不了,是政府不让做。现在的慈善事业,暴露出很多不公平的状况。未来中国有更多的人富裕之后,做慈善事业的会越来越多,但我们的体制环境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。我本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:包括茅于軾教授、吴敬琏教授、林毅夫教授,我们十几个人,在三十年前做了一个富民基金,有两个目的:第一是帮助农民工的培训;第二是资助农村的小额贷款,但至今没有被注册下来。

同样的道理,在医疗体制改革问题上,我曾经说,政府有责任提供医疗保障,但没有权力不让私人办医院。如果允许私人办医院,政府花在医疗上的钱,可以大大转到低收入阶层身上。因为高收入阶层的人,会花高价到服务方便,不用排队的医院,这就把更多的医疗资源让给了困难人群。而且,政府还可以向私立医院征税,进一步补贴困难人群。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。而现在,看看北京,看看全国,越是好的医院,越是把大部分的费用都花在一小部分有特殊地位、特殊关系的人身上。

一个严重的误解:市场导致不平等

对于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,大部分人都很担忧。但有人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,甚至有人认为,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扩大。这其实是一种误解。

从历史上看,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?是富人吗?不是。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。举个简单的例子,爱迪生发明了灯泡,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。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,因为富人有钱,没有灯泡,他可以点很多蜡烛;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。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,每个人都可以听明星唱的歌、看明星演的戏,而过去只有少数富人、王公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。汽车也这样,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,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代步工具。所有新产品技术都是这样。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,不是特权阶层。

再看中国改革的历史。我1977年考上的大学,那时候全国总共招了28万大学生,后来连招可能是40万。那时候,高中生中只有不到5%的人有机会上大学。这些人中,相当一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、父母有历史问题的,当兵去不了,招工去不了,没有任何希望,只好在家里看书,结果赶上恢复高考,考上了大学。1980年代的城市个体户,大部分是社会底层的群体。因为稍微有特权的人都去当兵了,去政府、国有企业工作了,而没有特权、没有关系的人怎么办?只好自己捡破烂,摆摊卖瓜子,结果反倒富裕起来。

这说明,改革使我们的社会垂直流动性大大提高了。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表明,在中国,1990年收入最低的1/5的人,到1995年仍然处在这个群体的比例,远远低于美国。也就是说,中国收入者的垂直流动性要比美国高。这一点可以理解,因为中国本身是在剧烈变化过程中,而美国社会相对比较稳定。比尔·盖茨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。但在中国,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,经过奋斗或创业,进入中产阶层的人,就比美国多。

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,我作过一个统计,在中国30个省、市、自治区当中,平均而言,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,国有经济部门最少的地区,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区,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。

这说明什么?如果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少,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就多,竞争就激烈,商业活动的利润就低;如果这个地区只有少数有特权、有关系的人能做生意,或只有最胆大的人敢做生意,做了之后盈利就很高。举个例子,浙江一带做生意的人比较多,富人也多,但利润都很薄。但像东北这样的地方,大部分人都做生意,但做生意的人一定赚大钱。为什么?因为他们的市场环境不好。所以我们看到,市场越开放,政府干预越少,地方收入差距越小。

另外,平等不仅仅体现在货币收入上,还包括其他的方面,如自由、权利、选择等。过去老百姓有什么自由?我在农村的时候,农民家里生产的西瓜、苹果,到集市上卖,被发现,算作投机倒把,要批斗,甚至关起来,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。那时候农民一年四季吃不上肉,也买不起,但只要公社的干部来村里,大家都抢着请客,有点白酒、有点肉都留给干部吃。为什么?只有跟他关系搞好了,孩子才有当兵、招工之类的机会。所以,改革开放不是使中国社会变得不平等,而是更平等。

拒绝“卖拐”——坚定对市场经济的信念

市场经济很脆弱,容易受到损害,需要有人去捍卫它。市场经济就是这样:当你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,你只会盯着它的坏处;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,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,它的好处是什么;当你自己把它弄坏的时候,你还骂它,怎么这么糟糕。

这就跟人一样,本来没病,但有人不断说他有病,非给他吃药不可,最后就吃出病来。这也是赵本山的小品《卖拐》告诉我们的真理。现在好多人在“卖拐”,本来你的腿不坏,他一定说是坏的,说到最后,你自己认为自己的腿不行了,只好买他的拐。在今天的社会上,这个拐是什么?就是大量反市场经济的言论。我说这些,只有一个目的,就是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,坚定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。中国的未来最值得担心的不是什么?不是能源、环境问题——这些当然很重要,但不是最重要的,因为市场竞争推动的技术进步一定能为我们找到答案。我们没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或30多年前的罗马俱乐部那么悲观。中国的未来发展,取决于我们的信念——我们相信什么,不相信什么。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,不断推进改革,完善市场,中国的未来会非常好。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,制造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,中国的未来就面临着曲折和危险。(全文完)

■财富漫谈

钞票“过劳死”

◎张晓晖

前不久,在报上看到某日本企业员工“过劳死”。国内也有这样的事情。说白了就是员工太勤奋了,不知道歇一歇,像上满了发条的钟表,最后猝然倒下。现在看着市场上的成交量,感觉钞票也太勤奋了,整天折腾个不停,会不会有一天也“过劳死”呢?

回顾资本主义上百年的发展史,我们会发现经济危机的形式发生了改变,从小学的《社会发展简史》到中学、大学、研究生的《政治经济学》,一件上衣和三十斤大米交换了好多年,对经济危机也是再熟悉不过了。工厂银行倒闭、工人失业、大桶的牛奶往太平洋里倒,奶牛则被宰杀或活埋——资本主义真是罪恶,这么多好东西糟蹋了,这不是作孽么?咱还喝不上牛奶哩。

那个时候那样做,肯定也是出于无奈。资本家们知道怎么做对自己最有利,这种没有力法的办法也是当时经济机制下的产物。但回顾几十年的经济发展,似乎经济危机的形式已然发生了变化: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工人,因为工人大不了失业,而股市里的投资者则被打得分文不剩,还可能负债累累。这就是说,经济危机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,当年是“生产高涨—过剩型衰退”,现在则是“资产泡沫破灭型衰退”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?当初,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是准确的: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,说白了就是一哄而上,导致生产过剩,然后一败涂地,最后一哄而散。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,一是资本主义初期企业家心性不成熟、经验不足,二是信息传递慢,从美洲到欧洲,船要走几个月,黄花菜都凉了。

后来,电报发明了,再后来电话发明了,飞机上天了,网络也出来了,信息的传递速度越来越快,对封建社会的“八百里加急”的飞骑报信到每秒三十万公里的电信传递(每秒绕地球七圈半),信息的问题解决了,打开电脑可以看到纽约、伦敦、香港、东京的股市信息,生产行为的盲目性大大减少了。

实体经济生产的盲目性可以减少但不可能消除,因为人性的弱点永远无法消除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,那就是钞票总要往地方去,如果不进入实体经济领域,那就要进入虚拟经济领域——股市、债市、房市、期市,钱没地方去就急着——冲进股市,股市有了泡沫;扑进期市,就把有色金属抬起来了;扑进房市,就把房价折腾上去了;整得没处去的钞票们一通乱窜,一进古玩,真个葫芦虫触触儿蹦扶摇直上,一进艺术品市场,徐悲鸿黄宾虹吴湖帆的作品一飞冲天。

清朝的“找”房款

◎李开周

今天买东西,标价八十,给人一百,对方收了钱,会找您二十。在这里,“找”是找零的意思。规范点儿说,就是卖方把超出商品价值的那部分货款退还给买方。

过去买东西,标价一百,人给八十,一咬牙,卖了。随后又觉得亏,喊住买家,让他再掏二十。这种行为在清朝也叫“找”,不过不是找零,而是找要。规范点儿说,就是卖方向买方追讨一部分货款,以补足商品价值。

可见同一个“找”,古今含义大不同:在今天是“损有余”,在过去却是“补不足”。不信您翻《康熙字典》,这本过去的书给“找”释义,里面四个字写得分明:补不足也。当然,不敢说“找”在过去一定就是指“补不足”,但至少清朝的不动产交易中,这个字有“补不足”的意思。有例为证:康熙六十年(1721),江苏省武进县居民刘文龙以七两二钱的价格卖了一亩八分地,八年后,刘某说“原价轻贱”,又委托中介向买主“找”了一两二钱。(参见《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》第1196、1213页,以下简称《考释》)咸丰元年(1851)六月,浙江省山阴县居民高宗华以十八块大洋的价格卖了六分地。三个月后,高某说“契内价银不足”,又委托中介向买主“找”了七块大洋。(《考释》第1380页)道光年间,浙江省萧山县居民王某卖掉自住堂屋一间和阁楼一座,后来王

天,一进普洱茶,茶饼变成了金饼,一进宜兴紫砂,茶壶变成了玉壶……

钱呀,就这么窜来窜去,弄得哪儿都是泡沫。钱虽然窜来窜去,但各处的泡沫还在;就像一只钻进被窝的耗子,窜到哪儿,哪儿的被子就鼓起来,但耗子并不在那儿停留,又窜到别处去了,最后整个被窝都鼓起来了,但耗子却不知道哪儿去了。

等到有一天人们忽然发现耗子不知道哪儿去了,于是信心崩溃,所有的泡沫都破了,所有纸面上的富贵一律“归零”。从微观上看,家庭发现自己的资产大大缩水;从宏观上看,报纸会说有多少万亿的财富蒸发,相当于多少年的GDP云云。

究其原因,就是钞票跑得太勤奋,钞票过于劳累,于是泡沫产生,钞票“过劳死”的时候,泡沫破裂。

日本房市股市双双破灭,被称为“失去的十年”,归根结底就是钞票太累了,这一歇就是十年。钞票歇了,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就没法快速旋转了。金本位制必然导致通货紧缩,因为黄金的储量存量开采量满足不了人们的想象力,满足不了经济快速增长的资金需求;而美元本位实际上是纸币本位,必然导致滥发货币导致货币贬值,何况货币贬值又符合本主的利益,墨银一推就出钞票,谁不想多印点呢?

钞票多了没处去,就窜来窜去,兴风作浪,把泡沫吹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,最后暴跌来了。

日本前车之鉴,自是后事之师。我们要汲取什么教训呢?按说,日本的泡沫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,因为其国家基本建设已经完成,新干线也修了,钞票如洪水泛滥,吸收不了,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不过我国如果出现这种情形,那就不仅仅是栽跟头的问题,而是错失了发展的良机。

流动性泛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。钞票多了,还有一万亿美元的的外汇储备在那里,是好事。中国不存在吸收资金的问题,因为我们土地需要资本了——中西部大量干裂的土地完全可以吸收泛滥的洪水,钞票多了没什么不好,把公路修到村里,电话网线铺到村里,农民能看电视能打电话能看期货玉米多少钱一吨,那就好了,钱多了不是正好办事么?把开发西部使命便就完成了,洪水被土地吸收了,多好呢?只是千万不要某县政府修了个小天安门,某镇政府修了个白宫——洪水应该灌溉田地,这是国计民生,如果用来看养金鱼,那就麻烦了。

流动性泛滥是坏事,也是好事,只是要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和正义,来把坏事变成好事。



让穷人的资产变成资本

关于产权保护对穷人致富的意义,秘鲁经济学家托托在《资本的秘密》一书中给出了很经典的证明。为什么落后国家的普通人那么贫困?因为这些国家缺少能把资产变成资本的制度。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?因为它所有的财产定义都明确,任何人都可以把资产变为资本。

这听起来比较抽象,举个例子:假如我有一栋房子,我想做生意,需要一笔钱。如果我的房子产权明确,就可以抵押给银行。我的房子值100万,银行可以给我贷60万,这样我的企业就可以做起来了。十年以后,可能我就变成了很富有的人,但在落后国家做不到这一点。这本书的作者走访了几十个国家,作了大量的统计发现,第三世界穷人积累的财富有很多,比如说房产的价值是9.5万亿美元,但这些都是半合法半不合法的资产,可以使用,无法买卖。

看看中国的农民是不是这样?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群体,但农民手里都有值钱的东西——土地、住宅、宅基地,但他不能卖,即使进了城,也只能放在那儿。一边有值钱的财富放在那儿,一边在城市里又没地方住。这是很不合理的。如果农民真正获得土地的所有权,把那些宅基地卖了,在城里至少买一个四十平米的房,他就跟城里人一样了。但现在不能,因为政府不允许。土地只有使用、耕作的权利,没有交易的权力。

社会落后,不是我们没有资产,而是没有把资产变成资本的途径,所以很多人只能拿着金饭碗讨饭吃。资本市场的作用,就是让人们可以用未来交换现在。这是什么意思?我现在什么都没有,只有一个想法、一个计划书,但因为这个计划实现之后我可以赚大钱,所以现在有人给我大笔的钱。但如果产权没有很好的界定和保护,你有一个好的创业计划,政府不让你借钱,或者银行不相信你,不借钱给你,你就失去了致富的可能。

所以,无论在第三世界国家,还是像我们这些新兴的市场国家,要使穷人富裕起来,第一要务,是很好地界定产权,让穷人的资产可以变成资本。这样,每个人聪明的脑袋可以提现。如果不是这样,靠政府和世界银行给救济,靠各种慈善活动,抵消不了由于制度的不合理给穷人带来的损失。

政府应该做的:保护产权,推动竞争

为了完善市场,政府应该做什么?就是很好地界定产权、保护产权。只要政府真正做到这一点,真正保护人们的自由,每个人都会运用自己的优势,在市场上进行交换,达成合作,整个社会很快会富裕起来。

没有政府,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,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一种需要。但问题是,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企业不一样。企业不创造价值就不能获得收入,政府即使不创造价值,通过税收也可以获得收入。所以,很多政府的行为就容易超越自己的职责界限。另一方面,像前面所说,很多人缺乏理性思维,看到社会中出现某种问题,没有弄清真正的原因,就请求政府干预。实际上,许多情况下,政府干预越多,问题越大;问题越大,对政府的